

六朝詩人的評價問題 ——以陸機爲例的探討

鄧仕樑

(一)

歷史上的六朝，是個多災多難的時代。在漢末大亂之後，繼而有胡人入侵，終而偏安江左。劉宋以還，改朝換代頻仍，尤爲後世論者所痛心。大抵中國傳統讀書人，講究的是治國平天下的要術。六朝三百餘年間，王綱解紐，禍亂頻生，恐怕會有人說，一定是那個時代出了問題。如果我們相信文學是時代的反映，很可能會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有問題的時代，難免產生有問題的文學。

上文的假設到底是不是事實，我們不擬在這裏評論。這裏只打算舉一位六朝詩人爲例，考察當世和後代對他的評價，從而探討今天我們應該怎樣去評價六朝詩人的問題。

(二)

西晉詩人，以潘陸稱首。尤其是陸機，在當時有極高的聲名。當世文壇領袖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¹ 東晉葛洪盛稱其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² 至於唐太宗親撰的《晉書·陸機傳·論》則云：「其詞深而雅，其意博而顯，故是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³ 其所推許，又過於葛洪所標學的「一代之絕」了。

就五言詩來說，鍾嶸《詩品》舉出三個時代的詩壇領袖：「陳思爲建安之傑」、「陸機爲太康之英」、「謝客爲元嘉之雄」⁴，可以代表當時的一般評價。西晉詩人，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其間的高下，論者容或各有所見，但當時對陸機的稱許，絕無異辭，卻是明確不過的。葛洪《抱朴子·佚篇》引嵇道君曰：「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書而嘆，

1 《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孝標《注》引《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見《世說新語》上卷《文學》第四，文學古籍刊行社，1956。

2 葛洪語見《晉書》卷五十四陸機本傳所引。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

3 同注2。

4 見鍾嶸《詩品·序》。《詩品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恐其卷盡也。」⁵ 讀某一家作品，至恐其卷盡，應該是最崇高的贊美。陸機的詩文，要不是對當時人有極大的吸引，實在不可能得到這樣的讚嘆。

(三)

但是，我們只要舉出部分後世對陸機的評價，當會大為驚訝於意見之分歧。

隋唐之際，承六代餘風，隋劉善經謂「陸公才高價重，絕世孤出，實辭人之龜鏡，固難得文名焉」⁶，推之至極，仍是前代的論調。而初唐除了唐太宗親撰《陸機傳論》，其餘諸家，如令狐德棻《周書·王褒傳·論》、楊炯《王勃集·序》，都依前人評價，給予潘陸一定的地位。⁷ 但盛唐以後，陸機似乎已不為時所重。皎然《詩式》極尊謝靈運，卻不甚注意陸機。⁸ 中唐以後，後人比較熟悉的議論，若元白論詩，韓柳論文，與陸氏異趣，陸機聲華不繼，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宋代，六朝詩人大都得不到好評，而宋末嚴羽《滄浪詩話》有一條說：

「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下。」⁹

對陸機的評價，更與鍾嶸《詩品》大相徑庭。事實上，從宗代開始，論陸機者，大都毀多於譽。考其論旨，約有二端：

其一，認為陸機的詩但工塗澤，而不及於情。也就是說，陸詩但有技巧而缺乏內容，如陳祚明曰：

「士衡詩束身奉古，亦步亦趨，在法必安，選言亦雅，思無越畔，語無溢幅。造情既淺，抒響不高。……至於述志贈答，皆不及情。……大較衷情本淺，乏於激昂者矣。」¹⁰

黃子雲曰：

「平原五言樂府，一味排比敷衍，間多硬句，且蹈前人步伐，不能流露性情，均

5 見《北堂書鈔》卷一百，《太平御覽》卷六〇二所引。

6 見《文鏡秘府論》天卷所引《四聲論》。今學者皆以為《文鏡秘府論》所錄之《四聲論》即隋劉善經所撰。周維德校點：《文鏡秘府論》頁24，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

7 《周書·王褒·庚信傳·論》以潘陸張左上方曹王陳阮，以為「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見《周書》卷四十一，中華書局標點本，1971。楊炯《王勃集序》：「洎乎潘陸奮發，係許相因，繼之以顏謝，申之以江鮑。」見《楊炯集》卷三，中華書局，1980。

8 皎然《詩式》嘗在「用事」一節引陸機《齊謳行》為例，此外未論及陸機。見《歷代詩話》本《詩式》。

9 見《滄浪詩話·詩評》第十二條。《滄浪詩話校釋》頁142。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

10 見《采菽堂古詩選》卷十。引自《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頁280，中華書局，1962。

無足觀。當日偶為茂先一語之褒，故得名馳江左，實晉詩之下乘也。」¹¹

綜合這一派的意見，則陸詩無論述志贈答乃至樂府羣篇，都不能流露性情，自是大違「緣情」之旨了。

其二，認為陸詩並技巧亦不佳。技巧上的毛病，又約有二端：第一在於過為繁縟，這一點六朝人已經注意及之。不過晉宋齊梁論者，倒是嘆美其「才大」的居多，即嫌其繁縟，也未加深責，不若後世之以此為大病。元代陳繹曾《詩譜》論陸機：

「士衡才思有餘，但胸中書太多，所擬能痛割捨乃佳耳。」¹²

還算是比較客氣的。第二個技巧上的毛病，是濫用排偶。明代王世貞說：

「陸士衡翩翩藻秀，頗見才致，無奈俳弱何。」¹³

至清沈德潛謂：

「士衡詩亦推大家，而意欲逞博，胸少慧珠，筆又不是以舉之，遂開出排偶一家。……降自梁陳，專工隊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臥，未必非士衡為之濫觴也。」¹⁴

則陸機的罪狀，還有一條是對齊梁造成壞影響，不獨自己的詩做不好而已。

上述這兩個論點，在現代人的評語中也約略可見。余冠英在《漢魏六朝詩選》中說：

「陸機的詩名重當時，但排偶雕刻，往往缺乏情韻，在晉詩中不為上乘。」¹⁵

其實已經綜合了這兩種意見。其他如胡適以為三張二陸兩潘都只是「詩匠」。¹⁶陸侃如、馮沅君以為潘陸都是「低能詩人」，「是同樣的不高明」¹⁷。我們單從《中國詩史》敘述六朝的篇幅，就可見陸馮二君對六朝詩的輕視。《中國詩史》還有一段話說：

「然而三張二陸兩潘的作品實在沒有很高的價值，只有左思還比較值得我們研究。」¹⁸

11 見《清詩話》本《野鴻詩的》。《清詩話》頁861。中華書局，1963。

12 見《歷代詩話續編》本《詩譜》，《歷代詩話續編》頁629。中華書局，1983。

13 見《歷代詩話續編》本《藝苑卮言》卷三。《歷代詩話續編》頁990。

14 見《古詩源》卷七陸機下按語。《古詩源》頁156。文學古籍刊行社，1957。

15 見《漢魏六朝詩選》頁151作者陸機下按語。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16 見《白話文學史》第八章頁95。香港應鍾書屋，1959。

17 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頁342及351。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18 同上注，頁339。

其實站在文學史的立場看，當時名重一世的詩人，到今天竟然有學者管叫做「詩匠」，評定「不高明」，以為不值得研究，這倒是值得我們好好研究的現象。要是潘陸都是「低能」，那麼在那個時代推許陸機有「大才」，「才高詞贍」¹⁹的許多人，不也都是低能兒了麼？

(四)

對於一位作家，歷代評價不同，本來不值得奇怪。不同的評價往往只是反映了不同的口味。清代以來，賞識陸機的不是沒有，如王夫之、劉熙載，都殊重陸機。²⁰近人王闈運更極尊陸詩。²¹不過那些意見始終不能算是主流。值得注意的，是後世對六朝評價之低，口味不同猶在其次，最主要的卻是由於文學觀念的歧異。口味和文學觀念的分別在那裏呢？這裏試打個比方。譬如我們吃菜，鷄鴨魚肉，各有偏嗜，因此對於各種菜式有不同的評價，那是口味的問題。也許一般說來，人的口味是相當接近的，這就是孟子說的「口之於味，有同者也」²²，但無可否認，口味有時可以相去極遠，所以一切批評不可能絕對客觀，劉勰論文，也注意到口味的問題，所以說「伊摯不能言鼎」。²³至於文學觀念的不同，那好比素食主義者，對於上面所說的葷菜，不管味道如何，他們根本不同意是可吃之物，因此可能在品味之先，已經徹底否定，那麼一切評價也就不必談了。後世有一派批評者，對六朝正是採取了根本否定的態度。最危險的，就是未經細讀那個時代的作品，已經加以否定了。當然還有更糟的是連自己有甚麼立場都說不上，只能人云亦云，從未經過體味、思考，只有盲從別人去妄加褒貶。看來這個情況是相當嚴重的，恐怕這是由於我們還缺乏適當的文學批評訓練。

那麼，在文學觀念上，根本的分歧在那裏呢？我以為正在於詩的本質問題。在陸機看來，詩的本質是「緣情而綺靡」的。²⁴《文賦》提出了這個觀念，影響及於六朝大部分作者。「緣情」是寫出心中的感受，所謂申寫鬱滯，當然是傾向於個人化的。而每個人的

19 鍾嶸《詩品》陸機評語稱機「才高詞贍，舉體華美」，又謂「張公歎其大才，信矣」。今案張華評陸機，未見有「大才」之語，注1所引文章傳尚有張華評機之語：「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意者鍾君據此謂「張公歎其大才」乎？

20 王夫之《古詩評選》，頗推許陸機，謂其「風骨自拔，固不許兩潘腐氣所染」。（《古詩評選》卷四）劉熙載《藝概》則謂機「有累句，無輕句，便是大家品位」，又謂：「士衡樂府，金石之音，風雲之氣，能令讀者驚心動魄。雖子建諸樂府，且不能專美於前，他何論焉！」（並見卷二）

21 王闈運論陸機語散見《湘綺樓說詩》（王簡輯，香港龍門書局重影本）及《八代詩選》眉批（見冬士撰《八代詩評》所輯，載《同聲月刊》第一卷第一、二、三、五、六號）。

22 見《孟子·告子上》。

23 見《文心雕龍·神思篇》。

24 「詩緣情而綺靡」是陸機《文賦》論文體之首句。

感受不同，因此內容也不會是固定的。倘若我們以為詩非得寫某種內容不可，自然不能接受「緣情」的詩，《文賦》還有幾句話：

「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²⁵

則落葉柔條，以至四時萬物，都是感不絕於詩人之心者。要是認為這些根本不值得「感」，寫出來也無與於興觀之旨，那恐怕在評價之先，早已加以否定了。這種態度在宋人詩話裏已經表露出來，如張戒說：

「潘陸以後，專意詠物，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增，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²⁶

可見六朝以為詩正當「緣情」，後世卻可以直斥緣情之作，以為「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至於「綺靡」，實在是六朝詩人追求的效果。鍾嶸以為詩除了以「風力」為幹，還要潤之以「丹采」，始能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²⁷，卻想不到在後世某些人看來，「綺靡」也是一大罪狀。謝榛在《四溟詩話》說：

「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夫『綺靡』重六朝之弊，『瀏亮』非兩漢之體，……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渣穢矣。」²⁸

謝氏論詩，時有可觀，可是對於「綺靡」，卻表現了難於理解的厭惡，試看這一條：

「黃司務問詩法於李空同，因指場圃中菘豆而言曰：『顏色而已。』此即陸機所謂『詩緣情而綺靡』是也。」²⁹

可見他以為陸機所重的，不外「顏色而已」。其中「而已」兩字，也下得太輕率。據陸氏的主張，詩除了「綺靡」之外，不要忘記還有「緣情」。《文賦》固然強調文采，但在「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聲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之外³⁰，其實絕不忽視情思理致，不過在謝榛看來，似乎「綺靡」足以掩蓋其餘。《四溟詩話》另有一條：

「陶潛不仕宋，所著詩文，但書甲子。韓偓不仕梁，所著詩文，亦書甲子。偓節行似潛而詩綺靡，蓋所養不及爾。」³¹

25 見陸機《文賦》。

26 見《歲寒堂詩話》卷上，《歷代詩話續編》本頁450。

27 見鍾嶸《詩品·序》。

28 《四溟詩話》卷一。《歷代詩話續編》本頁1146。

29 同注28，頁1174。

30 並陸機《文賦》語。

31 同注28頁，1140。

其論調竟以為即使節行可尚，但只要詩涉「綺靡」，便成大累。可見在他的觀念中，「綺靡」實在是詩家大忌。基本的觀念相去若此，則一切評價的分歧，就不足怪了。陸、馮二氏的《中國詩史》，有一句判斷語來得最直截：

「此時詩歌的基本思想，大都是不健全的。」³²

試想想看，要否定一個時代，有甚麼方法比判定其「基本思想」「不健全」更簡便呢？我們不必討論這種態度正確不正確，但要指出，倘若接受了這種論調，則對六朝自難有公允的評價。還可以舉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在最近出版的書裏，注釋者對陸機《文賦》「綺靡」一詞有這樣的解釋：「侈麗、浮艷。」³³這樣的態度倒可以看出一個問題。今天我們固然可以反對陸機的主張，甚至不求了解「綺靡」指甚麼，但我們絕對不能強把有了偏見的觀念加之於陸機。李善《注》云：「綺靡、精妙之言。」³⁴說得比較抽象，我們也可以不同意。但要知道，在文學批評的術語裏，「侈」字「浮」字並不是恭維的字眼，「侈麗」、「浮艷」在今天都是貶義詞，觀《文心雕龍》說：「浮侈者情為文使。」³⁵可以明白當時人用這些字眼頗有貶意。陸機以「緣情」為先，應該不會認為詩是應該「侈麗」、「浮艷」的。用這樣的詞語去解釋「綺靡」，是基本方法上的錯誤。³⁶

上面的分析，希望可以幫助解答一個問題：對陸機的評價，何以歷來有這樣大的歧異？

(五)

這一節我們也不打算對陸機詩作全面的評價，只想再提出一些有關的問題，加以申論。主要的問題是：如果我們把詩看成理應「緣情而綺靡」之作，那麼，我們可以怎樣看陸機呢？

32 同注17，頁335。

33 見《中國文學史名篇引文注釋》頁206。廣西民族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34 見《文選》卷十七李善《注》。

35 見《文心雕龍·章表篇》。

36 按六朝固然也有用「浮艷」一詞去評論當時文的，如《顏氏家訓·文章篇》：「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這「浮艷」是指當世的流弊說的。按陸機的觀念推論，則「緣情」正是「本」，「浮艷」則是流弊，何得舉流弊以為詩之本旨！至於「侈麗」一詞，「侈」字在六朝一般帶有貶意已如前述，而唐代令狐德棻在《周書·王褒·庾信傳·論》嘗用以論潘陸，但尋繹原文：「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出處見注7），則「侈麗之才」是指才藻宏麗而富益，與作品的過分華美不同。「侈」字總有過分之意，鍾嶸評陸詩謂其「舉體華美」，但到底不是過分華美。說文才「侈麗」，還可以有恭維之意，說詩風「侈麗」，就顯然有貶意了。

後世有些人批評六朝，很有信心。因為六朝是基本思想不正確，不正確就該否定。其實當時人批評詩，也顯得很有信心。譬如鍾嶸，他以為「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³⁷。為甚麼在鍾嶸看來，詩歌的高下，跟奕棋那麼容易判定呢？因為詩歌是藝術，藝術品必然有屬於技巧的一面，而技巧是比較能夠客觀評價的，所以說：「詩之為技，較爾可知。」把詩看成純技巧，固然偏頗不全。這也不是鍾嶸的原意。《詩品》重情怨，兼求「風力」與「丹采」之配合。「風力」、「丹采」二詞，說者意見紛雜，這兒不能詳加剖析。簡單地說，「風力」與「緣情」有關，「丹采」則與「綺靡」有關。用今天的話說，凡是內容和形式結合得好，能夠感人的詩，都是好詩。因此批評詩人，可以先看他是否有情怨，能不能感人，然後再分析他的技巧。

首先，從「緣情」的角度看，陸詩確乎是「緣情」的。今存陸機數十首五言詩中，以擬古和樂府為多，其餘是自抒懷抱與贈答之作。擬古和樂府，托古題而屬詠，原不乏自我的投射，如《悲哉行》：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
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
翩翩鳴鳩羽，啾啾倉庚吟。幽蘭盈通谷，
長秀被高岑。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傷哉客遊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
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
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³⁸

這首詩鋪陳芳春物色，然春芳可悅，客心易傷，其去國懷鄉之意，表現得很明顯，怎麼可以說「不及情」呢？近人沈曾植說，陸機樂府《猛虎行》等十七首，實具深心，是「士衡詠懷詩，非泛然擬古」。³⁹其實詩人以自己的眼觀物，無論寫的是甚麼題材，刻劃出來的都有自己的影子，我們不能隨便低估擬古樂府一類詩。至於自抒身世之作，如《赴洛》二首，《赴洛道中》二首，寫情尤為深刻。茲舉《赴洛道中》二首：

「摠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之，
世網嬰我身。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
林薄杳阡眠。虎嘯深谷底，鷄鳴高樹巔。

37 見鍾嶸《詩品·序》。

38 《悲哉行》見《文選》卷二十八。

39 見沈曾植《海日樓札叢》頁274。錢仲聯輯，中華書局，1962。

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
沈思鬱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
按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
頓轡倚高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
明月一何朗。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⁴⁰

士衡兄弟入洛，去父母之邦，事寇讎之國，在陸機是一生中最重要最冒險的決定，所以不免百感交雜，顧影自憐，讀者應該細細體會他的心境。陸機為吳大將陸遜陸抗之後，早歲曾領父兵為牙門將。吳亡以後，退居鄉里十年。後奉召入洛，既為高門之後，又以文才為世所重，屢參機要，而捲入諸王鬥爭的漩渦，終於遇害。表面看來，自是依附諸王，熱中功名，論者固有因此而貶斥陸機的。不過論人實在未易，後世若章炳麟論人少所許可，於陸機則以為「以機之文行忠信，而點污於賈謐，備二十四友焉。涅而不緇，出入未嘗與傾側謀」⁴¹，可供參考。陸機既是「服膺儒術」的人⁴²，而儒者以為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陸機父祖功勳蓋世⁴³，他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⁴⁴，自然希望建功立業，無忝祖宗徽烈。事實上，祖宗的勳績，對他轉成沈重的負擔，無時不欲有所建樹，《遂志賦》頗能寫出這種心情：

「仰前蹤之緜邈，豈孤人之能肖。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程。擬遺跡於成軌，詠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⁴⁵

又《贈弟士龍詩》十首之四云：

「俯慚堂構，仰懼先靈。孰云忍媿？寄之我情。」⁴⁶

也可見其心情之沈重，我們不宜以奔競之士視之。《赴洛道中》第一首有一句：「悲情

40 見《文選》卷二十六。

41 語出章炳麟《陸機贊》，見《太炎文錄初編》卷二。《章氏叢書》本，台灣世界書局影印本。

42 「服膺儒術」四字見《晉書》陸機本傳。

43 陸機父祖陸遜、陸抗為吳股肱之臣，陸氏家族在朝者亦盛，《世說新語·規箴篇》有一條記載：「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陸凱為遜族子，亦即陸機的叔父輩，累遷左丞相。

44 《晉書》陸機本傳語。

45 見《陸機集》卷二，中華書局，1982。

46 見《陸機集》卷五。

觸物感。」感的是甚麼呢？《懷土賦·序》云：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⁴⁷

我們只要留意探察陸機的內心，就會發現國破之後，有志氣的高門子弟，一意要另建一番功業，心境是極其惶惑沈痛的。陸氏何嘗不知道「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⁴⁸，但即便心存鄉曲，仍然不免「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⁴⁹，卻是儒家的教養和家族的壓力迫使他不得不如此。對於這樣一位懷大才而兼大志的文人，一步步走向悲劇的結局，今天文學史家的責任，正是要分析他的內心世界。用一兩句話去否定他，不是過於簡便了當了麼？

其次，我們當然得承認，即有深情，未必便是好詩，我們還得看怎樣把情表達出來，這也可以說是技巧的問題。

上文引述了好幾位批評家的意見，他們以為陸詩的毛病之一是排偶。可是我們要問，排偶的手法，在陸詩裏有甚麼任務？有甚麼優點和缺點？倘若只因排偶而加以否定，恐怕倒是純就形式的批評了。陸詩的對偶，到底多到甚麼程度呢？根據高木正一的統計，陸機詩中使用對句的比率是百分之三十五點六，謝靈運卻達到百分之六十以上。⁵⁰不過這只能說明用對偶的風氣愈來愈盛，卻不能據以評定優劣。試舉杜甫的情況來討論。杜甫用對偶的比率有多少，沒有人作過統計，可是杜公多律詩，律詩至少一半是對句，而老杜的古體、絕句也不乏對句，加上排律全篇為對，那麼杜詩的對偶比律恐怕有百分之五十左右，我們能不能說杜詩排偶過於陸機，因而不及陸機呢？可見我們需要的是更細緻的分析。其實陸詩用對偶的現象，可以看作五言詩發展的一個里程。在他以前，對偶似乎沒有他多，在他以後，肯定有比他更繁密的。陸機用對偶雖然比較刻意，可是有沒有生硬允贅的成分呢？我想我們不能說沒有，但在律詩形成的過程中，對偶運用的漸趨成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們不能要求西晉時代的對偶，跟盛唐一般成熟，不過晉詩也有晉詩的味道，要挑毛病是可以的，但是一例貶抑，卻不是應有的態度。這裏既不準備詳論陸詩，只好從另一個角度看。譬如說，要是後世傳誦的詩句，其用心不乏源於陸詩的，則陸機之作，自然不容加以輕率否定吧。這方面的例子且舉幾個：

(一) 《赴洛道中》第二首：「清露墜素暉，明月一何朗。」⁵¹寫夜中風勁，而忽仰

47 見《陸機集》卷二。

48 見陸機《招隱詩》，《文選》卷二十二。

49 見陸機《於承明作與士龍》，《文選》卷二十四。

50 見高木正一：《六朝律詩之形成》，鄭清茂譯，《大陸雜誌》第十三卷第九、十期。

51 同注40。

望見月，表現了一時的憬悟，這正是鍾嶸推崇的「即目」、「直尋」。⁵²大謝詩：「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⁵³「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⁵⁴正是這種寫法。

- (二)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⁵⁵看似平平無奇，但由感物而慷慨而懷古，似乎下開陶詩：「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⁵⁶「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⁵⁷但陶於直致中兼有風華，後世知陶者多，未嘗沒有道理，但論其用心，則陸陶有近似處。又陸機有《挽歌》三首，下啓淵明之挽歌。陸詩：「側聽陰溝涌，仰觀天井懸。」⁵⁸想像墓中光景，陶詩中如：「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⁵⁹用意也略相似。
- (三) 《為顧彥先贈婦》第一首：「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⁶⁰後代名句，用此意的不可勝舉，如謝朓《酬王晉安》：「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⁶¹綦母潛《早發上東門》：「時命不將明主合，布衣空染洛陽塵。」⁶²秦觀《聞雁懷邵仲恭》：「白袍居士如相問，為說緇塵染素衣。」⁶³高啓《梅花》九首之七：「愧我素衣今已化，相逢遠自洛陽歸。」⁶⁴論意象，以小謝「緇塵染素衣」為尤美，但創始之功，不得不推陸機。

大抵太康詩人，處於「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功；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的建安之後⁶⁵，銳意於命意與修辭上求新變，要求「析文以為妙，流靡以自妍」⁶⁶，因此創出另一番面貌。其與建安不同的地方，正是晉詩的精神所在。這種作風下開南朝，是五言詩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陸機詩有比較生硬的地方，黃子雲《野鴻詩的》說他的樂府「間多硬句」⁶⁷，本是事實，那正是銳意求新，而技巧上一時追不上的結果，因此有些

52 鍾嶸《詩品·序》論用事一節云：「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又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

53 謝靈運《初去郡》，見《文選》卷二十六。

54 謝靈運《登池上樓》，見《文選》卷二十二。

55 見《文選》卷二十六。

56 見陶淵明《和郭主簿》第一首，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卷二，中華書局，1979。

57 見陶淵明《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陶淵明集》卷二。

58 見《文選》卷二十八。

59 同注58。

60 見《文選》卷二十四。

61 見《文選》卷二十六。

62 見《全唐詩》卷一三五，中華書局排印本，頁1372。

63 見《淮海集·後集》卷四，《國學基本叢書》本，商務。

64 見高啓《青邱詩集注》卷十五，《四部備要》本。

65 《文心雕龍·明詩篇》。

66 同注65。

67 同注11。

句子看來不夠圓熟。不過，這個現象到底是可喜的，是創作力强盛的表现。倘若但求圓熟，而犧牲了詩意，倒反而厭厭無生氣。陸詩如《豫章行》：

「促促薄暮景，壹壹鮮克禁。曷爲復以茲？曾是懷苦心。」⁶⁸

數句寫的是離別。上文已有「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之句，此承之說薄暮已自難堪，何可復爲離別？命意實同於柳永《雨霖鈴》：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⁶⁹

而柳詞傳誦千古，正由於寫來情辭尤爲鮮明緊湊。李善注「促促」二句云：

「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行不息，鮮能止之。」⁷⁰

則按李善的體會，薄暮的意象還有人將老去的意思。這就同於東坡「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⁷¹的詩意了。人生難免於離別，尤可悲者，則歲月將盡，終有不可復見之時，這是非常深邃的一層意思。觀乎此，愈能明白劉勰爲甚麼說：「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⁷²這類例子可以多舉一個，如《於承明作與弟士龍》：

「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感別慘舒翻，思歸樂違渚。」⁷³

短短四句，其實含有很深的意義。前二句每五字中，含有兩個表示因果關係的主謂結構：「懷往」與「歡絕端」，「悼來」與「憂成緒」。李善《注》云：

「言和悅纔往，歡已絕端，哀悼暫來，憂便成緒。」⁷⁴

李善《文選注》，一般但注出處，只在曲折深隱的地方才加以疏解引申。「懷往」二句。實下開大謝「感往慮有後，理來情無存」⁷⁵的句法。謝詩李善《注》云：

68 見《文選》卷二十八。

69 見《樂章集》上卷，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0印影本。

70 同注68李善《注》語。

71 見蘇軾《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蘇軾詩集》卷三，中華書局，1982。

72 《文心雕龍·體性篇》。

73 見《文選》卷二十四。

74 同注73。又《文選》六臣《注》濟曰：「言懷思往時之歡，絕其端也，哀來則憂心成其亂緒也。」以「懷」字爲動詞，理解有異於李善，然解「悼來」則云「哀來」，是仍作名詞解，如此則二句不能對稱，當以善《注》爲長。

75 見謝靈運《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脩竹》。《文選》卷三十。

「言悲感已往，而天壽紛借，故慮有迴復。妙理若來，而物我俱喪，故情無所存。」⁷⁶

大抵陸謝此類句子，在李善看來也算是意深的，故加以疏解。固然，意深容易流於生硬。但即使生硬，也不棄深意，正是那個時代的精神，卻也是後世覺得難於索解而重加責難的原因。又「感別」二句李善《注》云：

「舒翮，謂鵠。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鵠，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⁷⁷

可見陸機這兩句五言，其實作了極大的壓縮，李善不得不添字為之解。在文采繁縟的時代，固然有一點點意思而加以塗澤敷染的情況，但也有極力壓縮詩意的嘗試。凡此皆可見那個時代的詩人，不肯走前人鋪出來的通衢，而偏要刻意求變。這些變不一定都成功，但要是都不變，文學怎麼能夠進步呢？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從這個角度去看陸機，應該不至於那麼武斷的把他看成一無是處。

陸機固然有他的毛病。同時人張華以為他患在「太多」⁷⁸，即最佩服他的弟弟也以為他「皆欲微多」。⁷⁹東晉時孫綽以為「陸文深而蕪」⁸⁰《文心雕龍·才略篇》批評他說：「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⁸¹都很能指出陸機的病累。不過正如本文開始時徵引的評語，六朝人都正面肯定陸機的地位，給與最高的評價。近人劉師培有一個意見，他認為歷代文章得失，後人評論每不及同時人評論的確切。尤以漢魏六朝之文，五代後已多散佚，傳於今者益加殘缺，因此他有「各家文章之得失應以當時人之批評為準」之論。⁸²就同時人所見作品較為全面的立場說，這有一定的道理，就批評的立場說，卻不能簡單地以當時人的批評為定論。由於古今的文藝觀念、藝術口味、分析技巧都有所不同，批評一位詩人，有不同的結論，是不難理解的。撇開古代作品今天或已散佚的情況不談，與作者同時的批評家有他的有利條件，譬如生活在同樣的時代，使批評家更易了解作者的背景和一代的文學風氣，有時甚至可以直接與作者討論，如鍾嶸嘗與謝朓論詩⁸³，就是當世批評家獨有的機會。不過與作者同時的人，也有他的局限。如與陶淵明同時的顏延之，囿於時代風氣，幾乎全不能體會陶時的妙處，因

76 同注75。

77 同注73。

78 見注19。

79 陸雲《與兄平原書》，見《全晉文》卷一百二。

80 見《世說新語·文學篇》。

81 《文心雕龍·才略篇》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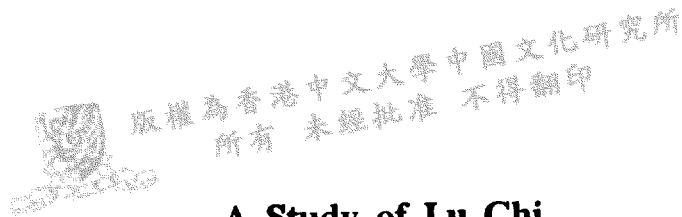
82 見劉師培《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羅常培記，香港新亞書院出版，1966。

83 鍾嶸《詩品》謝朓評語。

此在《陶徵士誄》只說他「文取達指」。⁸⁴至於後世的論者，由於跟作者有了距離，反而能夠更加客觀，能夠看清楚作者在一個傳統裏所佔的位置。而且由於文學理論和批評技巧的不斷發展，今天的批評家應該更加明白自己的立場。個人的口味和喜好對評價的影響，恐怕是不能避免的，但人云亦云的批評家，其實並沒有盡批評的任務。大抵同時代的批評家需要遠見，後世的批評家，則除了清醒的頭腦，更需要對批評的對象有深厚的同情，既不賤近貴遠，也不隨聲附和。今天一般文學史對陸機的評價，恐怕大都流於過分簡單化。文學史家的責任，如果不在於對古代詩人有精闢的評論，至少也該解釋何以當時的評價，與今天有這樣大的分歧。

本文希望以陸機為例，說明今天我們評價六朝詩人所遭遇的問題。當然，對任何一位詩人的評價，都是會隨時代而不斷發展的。歷代的評論如有參差，反而反映了批評家能夠正視自己的責任，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這較之雷同一響，不作深究的態度，是遠為可取的。

84 顏延之《陶徵士誄》，見《文選》卷五十七。



A Study of Lu Chi with a View to the Appraisal of Six Dynasties Poets

(A Summary)

Dang Shu-leung

The Six Dynasties saw a disaster-ridden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In general,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d a prejudice against literature of chaotic times. It is probably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 poets of the Six Dynasties were as a rule not held in high regard by critics of later generations. This phenomenon still prevails today. What is noteworthy is that the comments made by later critics are quite different in nature from those of the poets' own contemporaries. This article uses Lu Chi 陸機 as an example to compare the evaluations of him by his contemporaries and by critics of later generations, with a view to the examination of the problem of how we should appraise the poets of the Six Dynasties today.

Lu Chi was highly considered in his own times, but his fame as a poet declined since Mid-T'ang. In the Sung Dynasty, one critic even thought that "Lu Chi was inferior to all other poets (in Six Dynasties)" (see Yen Yü: *Ts'ang-lang Shih-hua* 嚴羽: 滄浪詩話). It was also from the Sung Dynasty onwards that the comments on Lu became unfavourable.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Lu's poems and examine the causes of the mixed reception of his poems by critics of different periods. Literary views, artistic tastes, and analytical techniques are changing from age to age, and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different assessments are given to the same poet. But this article wishes to point out that scholars should not be following with the prevailing trend. Although i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duty of a historian of literature to suggest brilliant expositions on ancient writers, he should, if he is conscientious, at least explain why there is such a gap between critics of our genera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writers' own contemporaries on the other.

